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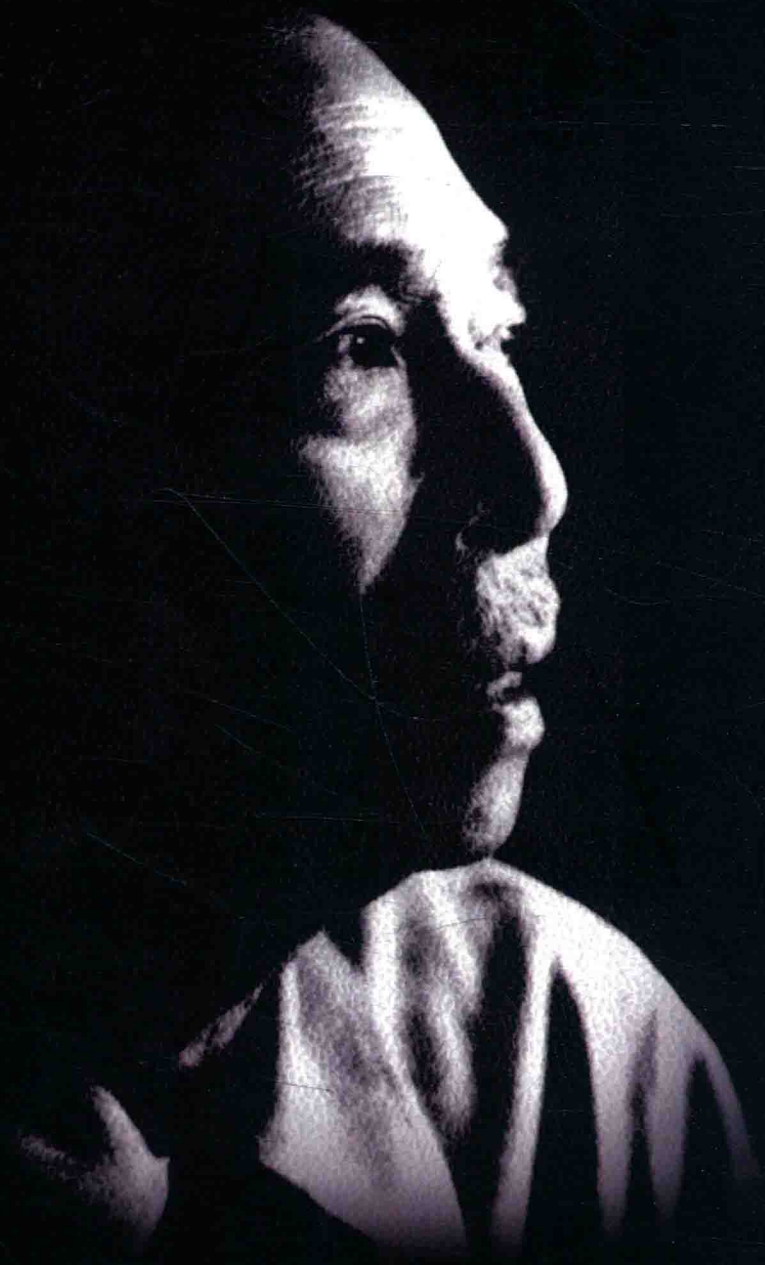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6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著 楊玉英◎譯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著
楊玉英◎譯

6

茅盾與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著，
楊玉英譯——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6+ 目 2+224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6 冊）

ISBN：978-986-322-689-5（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03253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689-5



9 789863 226895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 六 冊

ISBN：978-986-322-689-5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本書據 1969 年出版英文版 2013 年新譯

作 者 〔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

譯 者 楊玉英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著，楊玉英譯

作者簡介

馬立安·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1930 ~)，男，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教授，院士。畢生致力於中西思想文化史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即大量發表他的中國文學研究成果，至今已有六十年的研究歷史。他給予過關注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和批評家極為廣泛，其中魯迅、郭沫若和茅盾是高利克關注最多、研究最深入、研究成果也最豐富的三位文學大家。其研究成果部分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權威刊物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比較文學》等上發表。著有「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系列論文六篇。出版學術專著《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中西文學關係的里程碑（1898 ~ 1979）》、《影響、翻譯、平行——〈聖經〉在中國研究選集》等。

譯者簡介

楊玉英 (1969 ~)，女，樂山師範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教學。科研方向為英美文學、比較文學、海外漢學。已出版系列學術專著《英語世界的郭沫若研究》、《比較視野下英語世界的毛澤東研究》、《英語世界的〈孫子兵法〉英譯研究》和《英語世界的〈道德經〉英譯研究》。發表相關科研論文近 30 篇。

提 要

《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斯洛伐克漢學家馬立安·高利克的第一本英文專著，也是歐洲第一本用英文撰寫的茅盾研究著述，於 1969 年由德國威斯巴登弗蘭茨·斯坦納出版社出版。

該書展現了 1919 ~ 1936 年間茅盾的文學與批評道路，以及與這條道路的歷史或前史相關的最重要的方面。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特別對該書的史料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馬立安·高利克的這本專著在運用作者 1958 ~ 1960 年在中國期間所獲得的最廣泛的資料方面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是在挽救這些屬於現代歷史的最重要的當代研究資料，因為這些資料使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新文化的誕生顯得更加清楚。」

除普實克的「序」——「寫在『馬立安·高利克的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茅盾研究』的頁邊」和結語外，全書共有 11 章，分別對茅盾的青少年時期（1896 ~ 1920）、茅盾早期的思想發展、茅盾文學批評的第一步、茅盾論中國現代文學進退兩難的困境、1921 ~ 1930 年間文學研究會與茅盾的關係、茅盾論文人和文學的本質及其功能、茅盾論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茅盾論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茅盾論中國當代無產階級文學與世界先鋒派文學、1930 ~ 1936 年間左聯與茅盾的關係以及茅盾論文學創作與技巧問題等進行了詳細而獨到的論述。此外，書後還附錄了縮略詞表、術語表、參考文獻和索引，以方便讀者查閱。

書稿出版後，受到了歐洲其他著名的漢學家如佛克瑪、卜立德、史羅夫、何谷理、格魯納等的好評，並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的引用。

致 謝

本書的目的旨在展現 1919～1936 年間茅盾的文學與批評道路，以及與這條道路的歷史或前史相關的最重要的方面。

作者要誠摯地感謝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教授閱讀該書手稿並為該書撰寫序言。沒有他明智的建議，這本書要寫出來是不太可能的。

作者同樣要為茅盾先生（沈雁冰）為作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中國撰寫的兩篇文章添加的許多注釋表示感謝。沒有他對這些東西表現出的興趣，本書中的一些事情不可能弄清楚。

作者要感謝莫斯科的弗拉迪斯拉夫·索羅金（Vladislav F. Sorokin），要不是他，那些中文的縮微膠片將無法獲得。

作者要感謝哥本哈根的克里森·赫爾曼·詹森（Christian Hermann Jensen）和倫敦的約翰·勒斯特（John Lust），感謝他倆為該書提供的大量歐洲的和中文的書籍和縮微膠片。

作者同時也要利用這次機會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學者表示感謝，感謝他們與作者一起討論書稿的主題或閱讀書稿手稿。這些學者是：貝爾塔·克萊布索娃（Berta Krebsová）、泰莫迪斯·博考拉（Timoteus Pokora）、奧德瑞凱·克勞（Oldřich Král）和安娜·德麗札洛娃（Anna Doležalová）

作者要對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和鮑吾剛教授（Wolfgang Bauer）致以特別的感謝，感謝他倆接受該書手稿將其作為「慕尼黑東亞研究」系列叢書出版。

感謝斯洛伐克文學基金會提供的資金援助，該援助使得本書得以譯成英文。

最後，作者非常感謝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提供出版資助，該資助使得本書能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出版。

馬立安·高利克

序

寫在「馬立安·高利克的文藝批評家和 理論家茅盾研究」的頁邊

在為這位年輕的學者，這位中國文學最活躍的倡導者的作品寫上幾句話之前，我應該強調的事實是，馬立安·高利克是一位斯洛伐克人。有趣的是，在布拉格東方研究所組成的這個系統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小組裏，包括波蘭、德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學者，有兩位斯洛伐克的漢學家，馬立安·高利克和安娜·弗爾高娃－德麗札洛娃（Anna Vlčková-Doležalová）。他們兩位都在布拉迪斯拉發最近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工作，這從一開始就佔據了重要的位置。我並不認為這僅僅只是機會。斯洛伐克文學，像其他所有形式的斯洛伐克文化一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生活中至少與它的盟友捷克一樣處於平等的位置。有時，它似乎渴望瞭解和創造一些新的東西，一些在斯洛伐克比在捷克斯洛伐克更西部的地區要更加強烈的東西。因此，當斯洛伐克的學生開始研究中國的時候，一點也不顯得奇怪，他們選擇了最局部的問題——其他領域也一樣，只不過在文學方面更加突出而已，這是他們的同胞們的習慣性特徵。馬立安·高利克選擇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人物茅盾，而他的同事安娜·弗爾高娃－德麗札洛娃則選擇了毫無疑問稱得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郁達夫。

當時還是布拉格「東方研究講座」的學生的馬立安·高利克開始對茅盾作品的詮釋發生興趣，寫了一篇論茅盾短篇小說的研討會論文。在他長期呆在中國期間他收集了大量闡明茅盾生活和作品的各個方面的資料，為他即將發表的那些文章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參考文獻，並對茅盾曾經使用過的眾多的筆名進行了考證。由於有關茅盾的文學作品正被另一個德國同事，萊比錫的

弗里茨·格魯納（Fritz Gruner）用來做詳細的研究，他已經為他的博士論文準備了兩卷了，因而馬立安·高利克便專注於茅盾的文學和理論作品，其透徹的研究結果便是現在的這本專著。

我認為，今天我們只能對高利克先生當初的選擇進行祝賀。儘管茅盾的文學作品並沒有被進行完整的闡釋（這裡，我們可以希望當格魯納博士的書出版後，能夠從中看到一個更加具體和平衡的展現），但高利克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我們甚至都不敢猜想的未知世界。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們必須得時時問我們自己，是否茅盾終究作為一個批評家不比其作為一個富有創見的作家要更偉大，是否他對文學理論的貢獻並不是最重要的。同時，所有論述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的一系列問題以及關於闡釋和欣賞的難題，出現在我們的腦海裏。

這些問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是否我們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產生的觀點太過簡單和粗糙。我認為我們對於新時期之初的中國文學的印象就好比是與世界文學的海洋分離開來的蓄水池，被那個海洋中的涓涓細流慢慢地哺育著，同時也通過一堵無法滲透的牆被它干擾著。根據茅盾二十四歲前所熟知的歐洲文學來判斷，尤其是從他帶入自己的閱讀之中的那些成熟的批評觀點來判斷，顯然，這個年輕的、有才華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思想和文學作品比他那些同時代的歐洲人有著更為廣泛的認知。甚至在五四運動之前，茅盾就已經能夠對蕭伯納、尼採、彼得·克魯泡特金、伯特蘭·羅素、列夫·托爾斯泰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提供成熟的批判性的評價了。讓我們記住中國的知識分子會將他從歐洲源泉中獲得的知識和思想與他自己的文化中的那些雄偉壯觀的遺產相比較，這些遺產包括佛教哲學中那些微妙複雜的活的傳統。是在他們可以從中獲得的這些思想的不同種類和不同廣度中我發現了中國現代作家和文化工人的第一代中這種卓越力量的源泉和思想的獨創性，一種在隨後的幾代中普遍消失了的品質。

還有一個特徵是，在討論中國需要的新文學時，當許多作家對語言方面進行強調時，在胡適對創造一種新的文學語言的必要性和其他的要點進行強調時，茅盾卻首先在其中看到了對現代思想的介紹（原書稿第 64 頁）。這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只有使用新的方法，對世界進行新的闡釋的作家才能創作出現代的文學作品來。

茅盾在評價歐洲文學的根本趨勢時的斷言尤其可在他 1920 年 9 月對古典

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出來。他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觀察到，浪漫主義不能是革命的，因為它不涉及偉大的人格。在我看來，茅盾對於對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作家的描寫是特別深刻的。我覺得這位二十四歲的中國批評家比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的幾代批評家走得更遠。茅盾沒有接受現在人爲強調的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分歧。對他而言，最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是左拉和莫泊桑，福樓拜是其前輩，而巴爾扎克仍然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在這個理論中確實有許多方面值得加以討論，例如最後一個。但有一點是相當肯定的，那就是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有深刻的浪漫主義的特徵。對於茅盾對現實主義的發展的刻畫有許多可說——當然，比將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人爲地分割開來要說的更多。

同時，茅盾也正確地看到了現實主義的新特徵是科學和民主。在其作品的一開始，作爲批評家的茅盾就爲文學理論建立了一個合理的研究方法，沒有被一些時髦的口號的奉承所扭曲。創造性文學中自我意識的重要性問題，這個在前一階段討論的主要論題之一，毫無疑問被茅盾找了出來，並在其對浪漫主義作家的態度上加予以了強調。儘管他本人是現實主義的信奉者，但他並沒有在其中看到一個神奇的治療方法和解決創造性文學的問題的唯一之道。他以其非凡的洞察力相信，與世界文學的發展水平相一致的新浪漫主義將是那個時期的趨勢。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當茅盾越深信馬克思主義，他似乎就變得愈加保守。後來他譴責後現實主義的先鋒派文學是「傳統社會將衰落時所發生的一種病象。」（原書稿第 93 頁）

茅盾這些早期的觀點或許有助於解釋那個時代文學的一些特徵，諸如魯迅作品的某些不能以現實主義去加以常規闡釋的方面。歐洲學者認爲，中國總是在太晚的時候才開始去瞭解歐洲文學，打個形象的比方即是，他們的火車，總是在歐洲的火車離開了一個年代之後才姍姍到達。比如五四運動時期，甚至在其最後階段，中國作家都沒有搞清楚那個時期歐洲先鋒派作家的問題，但是卻對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及其他思潮的問題搞得很清楚。高利克認爲，這種假設必須加以重新思考，而且我們認爲可能影響了中國文學的那些歐洲思潮和流派的假設必須加以拓寬。實際上，中國作家沒有對他們能夠接觸到的歐洲文學加以充分的利用這一事實，並不在於他們的疏忽而是由於中國文學發展於其中的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條件所致。是這個原因迫使作家將他們的注意力僅僅局限在生活的某些方面，而這，自然就會影響他們對文學方

法的選擇。

另一方面，當茅盾對學習現實主義的文學方法的必要性加以強調時（這裡，他沒有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加以區分），他必然是正確闡釋了那個時期中國文學的需要的，也即是，科學的觀察和準確的描寫。準確地觀察和描寫其所見所聞是對每一位從事文學工作的人的基本訓練。作家們的不足之處正在於他們缺乏這種訓練，這在新、舊文學中都一樣，其結果便是作品缺乏那些基本的東西，淡而無味。茅盾沒有只警告作家們要當心缺乏對他們的主題的瞭解和描繪的不準確所帶來的危險，他也一樣看到了對所看到和意識到的東西並將它們轉化成綜合的文學作品太感興趣但卻無能為力所存在的危險。這是中國作家的第二個主要不足之處，一種僅僅只作照相式處理的傾向。茅盾非常恰當地指出：「如果一個作家將其限制在某一具體的材料中，那他寫出來的東西無異於普通的新聞報導。」（原書稿第 103 頁）

我並不認為其他的中國批評家指出過不僅是中國作家而且是所有的藝術所具有的這個根本的不足之處，這個與生俱來的淺薄（*dilettante*）的本質。中國的純文學和藝術，如中國繪畫，是淺薄文人的專利，大部分的通俗文學作品也是他們的傑作，這主要是面對大眾的。宋朝和元朝出現專業的藝術家這種趨勢受到了明朝文學正統的新發展的擠壓，也使小說特別是戲劇受到了影響。我認為這種淺薄文藝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主要特徵，到今天甚至被提高到了一種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的狀態。大眾將會創造他們自己的藝術，而不需要專業的藝術家。茅盾在這方面正確地看到，沒有專業的技巧，就沒有真正的藝術。這種專業的技巧在大眾藝術中是特別需要的。

茅盾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批評家，他還是一個老師，教我們如何組織一部文學作品，如何創作一部文學作品。

馬立安·高利克的書不僅表明了茅盾的作品在闡明中國文學與歐洲文學之間的關係上有多重要，他還證明了茅盾的作品為鑒賞歐洲文學中的各種潮流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因為歐洲人對這位傑出的中國批評家對待他們的文學的態度是很感興趣的。然而，在闡明中國舊文學方面茅盾的作品也具有非凡的價值。我們可以從茅盾有洞察力的觀察中看出他對這種文學中出現的問題思考得究竟有多深刻（原書稿第 27 頁），儘管這些作品總是只表現了一個人的感覺。舊時的作家是「作者的主觀型，僅只屬於他自己，最終只屬於一個階級。」同樣中肯的是「舊時的作家僅只研究文學的問題，只能寫通俗易懂的東西」這個觀點。我也一樣覺得，在中國舊小說中很難找到一個比茅盾

用「記述 (registration)」來代替「描寫」更好的限制詞了，特別是當他拒絕他所嘲笑的「記賬式的敘述」(an accountant's budgeting) 的時候。中國舊時的作家，不是進行綜合的描寫，而是常常簡單地羅列包含在所觀察到的現象中的細節，使這種「記述」充當了主題的藝術拼圖。這種認為中國舊文學最大的不足在於其描寫的藝術不夠發達的觀點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茅盾的作品中。他也責備這種文學，把這種文學看成僅僅是供娛樂而已。

在我看來，除馬立安·高利克對文學史所做的有價值的貢獻外，他的這本專著還具有非同尋常的局部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認為文學以及所有的藝術僅僅是宣傳的唯一工具的觀點四處流行，純粹美學的所有因素被排除在所有的藝術類別中。基本的類型成了僅為某種政治格言進行宣傳和證明的例外之作。創作者的內在視覺或他所見的周圍世界的真實生活的描寫被廢除，甚至現實主義的原則也遭到否認。來自文學的任何對話都消失了，我們只能聽到一面之詞，聽到宣揚極端激進的觀點的聲音，所有的反對之聲都沉默下來。茅盾的，同時也是馬立安·高利克的觀點將這些問題挖掘出來，並在該書中將其呈現在公眾面前，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取代那些在中國現時的論戰中沉默的夥伴。兩次大戰期間，例如在 1923 年，文學要麼是革命的工具，要麼毫無價值的觀點被提了出來。再如，戲劇被創作出來，恰讓人想到今天展現在舞臺上的大規模場景，成了政治口號的獨唱會。與此相反，茅盾指出，「僅僅用群眾大會時煽動的熱情的口吻來做小說是不行的」(原書稿第 103 頁)。我認為那些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去堅決地挖掘的、閱讀廣泛的中國批評家仍然應該清楚地拒絕這些原始的傾向，即便在今天也是有意義的。

我認為馬立安·高利克的這本專著在運用作者在中國期間所獲得的最廣泛的資料方面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同時，他也有機會與研究對象茅盾本人討論許多問題。事實上，這是將這些有價值的資料融合在一起的最後的機會。這在今天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了，我們甚至不清楚它是否沒有完全地消失。因而，馬立安·高利克是在挽救這些屬於現代歷史的最重要的當代研究資料，因為這些資料使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新文化的誕生顯得更加清楚。茅盾的作品表明了這個文化有多大的價值，而這本身又促使我們去對其進行更加密切的關注和研究。目前，這個文化還僅只能在歐洲進行研究。也正是這樣，我看到了馬立安·高利克著作的重要意義。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目

次

致 謝

序 寫在「馬立安·高利克的文藝批評家和理論家
茅盾研究」的頁邊

第一章	青少年時期（1896～1920）	1
第二章	早期的思想發展	15
第三章	文學批評第一步	25
第四章	中國現代文學：進退兩難的困境	39
第五章	文學研究會與 1921～1930 年間的茅盾	57
第六章	論文人、文學的本質及其功能	81
第七章	自然主義還是現實主義	93
第八章	論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	111
第九章	論中國當代無產階級文學與世界先鋒派 文學	129
第十章	左聯與 1930～1936 年間的茅盾	145
第十一章	文學創作與技巧問題	165
結 語		179
縮略詞表		183
術語表		185
參考文獻		189
索 引		201
譯後記		223

第一章 青少年時期（1896～1920）

（一）

茅盾的真名和官名叫沈德鴻，字雁冰，出生在青鎮，一個位於浙江省東北部桐鄉縣的小鎮。

沒有人知道這位著名的中國作家、文學批評家和文化名人確切的出生日期，只能僅僅依靠推測為 1896 年的 7 月 5 號或 7 號。現在要來搞清楚確切的日期是不大可能了〔註 1〕。他家住觀前街，有三間大房子。茅盾在老家生活了差不多十八年（除了他讀初中和大學的幾年）。之後茅盾也常回去，他的部分作品或提綱就是在老家寫的。〔註 2〕

茅盾家族原屬社會上層，但還不屬於地主階層，而僅是官僚階層〔註 3〕。他的祖父，名字不太清楚（沈煥？）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西江河岸梧州城的知府〔註 4〕。很難解釋為什麼茅盾的祖父沈硯耕只獲得了比較低的社會和經濟地

〔註 1〕 在《茅盾傳》中我提到茅盾的文章《我的自傳》，載《文學月報》1932 年第 1 期，第 173～175 頁。我在《茅盾傳》中寫道：「茅盾於陰曆 1896 年 4 月出生。」茅盾為我的斷言添加了如下信息：「我記得是陰曆五月（相當於陽曆六月）下旬（即從二十到三十日），故也可能是陽曆七月初也。」（第 1 頁）在一次我和他討論時他給了我更加準確的信息，他說由於印刷錯誤的緣故，《我的自傳》中他的出生日期被弄錯了。他出生於 1896 年的陰曆 5 月 25 日或 27 日。這相當於我們的 1896 年 7 月 5 日或 7 日。

〔註 2〕 茅盾常回老家。很可能他的《故鄉雜記》的部分內容就是在故鄉寫的，並且寫了一些筆記。他的一些短篇小說和文章就是以這些筆記為基礎寫成的。

〔註 3〕 茅盾，《我怎樣寫春蠶》，載《文萃》第 8 期，1945 年 11 月 27 日，第 13 頁。

〔註 4〕 參見《烏青鎮志》卷 27《吏事》第 32a 頁。沈季豪先生（1890 年生），是茅

位，他只是當舖的簿記。（註5）

茅盾的父親名叫沈伯蕃（註6），在經濟上他甚至比他的父親還要貧窮。在科舉考試中他僅通過了秀才的第一等，以當中醫為生。（註7）

茅盾是在中日戰爭（1894～1895）爆發之後一年出生的。那時正值所謂的第二次瓜分中國時期，包括俄國和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試圖在他們的霸權之下篡奪盡可能多的領土。顯而易見，對中國人民來說滿清政府是無能的，而且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文化的、經濟的還是政治方面的實際狀況都是難以防守的。李鴻章和張之洞將與如「中學為體」（Chinese studies a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西學為用」（Western studies for practical use）這樣的口號一致的改革介紹到中國的努力，也是徒勞的。

通過組織一場改革運動來克服這種令人不愉快的形勢已成必需。這場運動由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康有為（1858～1927）領導，它是一場由中國知識分子參與的、旨在維護君主政治、在一些改革的幫助之下鞏固中華帝國、解決那個時期的某些迫切問題的愛國運動。但這些改革既不非常特別，也不激進。有些改革旨在修改科舉考試和武舉考試的方法，為包括帝國大學在內的新學校的形成做準備。帝國大學的科目將包括那些在西方國家學校裏常規的教學科目，也包括傳統的經典學習。而且，還打算成立一個翻譯外國書籍的政府機構。新的鐵路將要修建。軍隊和海軍要改革。滿族人曾經的某些特權將被剝奪。光緒皇帝有權宣佈改革，但留給他進行改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這次運動很短命，歷史學家非常恰當地將其稱為「百日維新」。

茅盾的父親是個非常忠實的改革者。他對康有為的態度不得而知，但他對譚嗣同（1865～1898）這個激進、左傾的改革者的代表的態度卻非常清楚。沈伯蕃最喜歡的書是譚嗣同的主要哲學著作《仁學》。

沈伯蕃身體很糟糕。1902年，當茅盾六歲的時候，他染上了一種叫骨癆的病，只得完全呆在床上，四肢不能動彈。（註8）

盾父親最小的弟弟，告訴我茅盾的曾祖父曾是梧州的知府。

〔註5〕 沈季豪提供的信息。

〔註6〕 也是沈季豪提供的信息。茅盾在《茅盾傳》第一頁中對此加以了證實。根據索羅金（V. Sorokin）的看法，茅盾的父親名叫沈永錫。參見索羅金，《茅盾的創作之路》（*Creative Road of Mao Tun*），莫斯科，1962年版，第6頁。

〔註7〕 沈季豪提供的信息。也可參見孔另境，《懷茅盾》，載《庸園集》，上海，1946年，第65頁。

〔註8〕 茅盾，《我的小學時代》，載《風雨談》第2期，1943年5月，第5頁。文中

他最後的日子，在茅盾的記憶中是這樣的：

他臥病三年，肌肉落盡，那年夏天極熱，他就像乾了膏油的一盞燈，奄奄長暝了。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書籍和算草來整理；有幾十本《新民叢報》，幾套《格致彙編》，還有一本『仁學』，他吩咐特別包起來，說：「不久你也許能看了」。特別是那本『仁學』，他叮囑我將來不可不讀。〔註9〕

這位年幼的、甚至還不到十歲的小男孩開始閱讀譚嗣同的書。自然，他還讀不懂。而且即便是後來，他對譚嗣同的思想也不太感興趣。〔註10〕

侯外廬教授似乎理解了茅盾的父親對譚嗣同如此鍾愛的其中一個原因：

譚嗣同對於自然科學的重要性給予了強調。儘管他旨在把自然科學與儒家的、墨家的、道家的和宗教的思想系統揉合在一起，但他想要的是使其成為實際運用的一種工具。當他論及自然科學與他自己對於包括建立學校和購買機器之類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時，他謳歌自然科學，崇贊其力量，並對其進行了很好的闡述。〔註11〕

換句話說，沈伯蕃喜歡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因而，《格致彙編》雜誌是他的最愛。在數學方面，作為一個自學者，他甚至自修到微積分。只有死亡才阻止了他進一步的研究。〔註12〕

除數學外，沈伯蕃最感興趣的是天文和地理。在他身體還好的時候，他讓年幼的茅盾，其時才剛開始艱難地背誦《三字經》，每日背誦從《天文歌略》

茅盾說他父親深受風濕病之苦，但他在我的《茅盾傳》中對此加以了否認：「不是風濕病，叫做骨癆，不知正式名稱是什麼？」（第2頁）

〔註9〕《我的小學時代》第9頁。《新民叢報》是由一群改革者，即梁啟超的追隨者在日本橫濱出版的一種半月刊，於1902年1月1日創刊。傅蘭雅（John Fryer）的《格致彙編》是由上海長老會出版社出版的。這份季刊對西方科學，尤其是數學、藝術、工業產品的普及做出了貢獻。

〔註10〕《我的小學時代》第9頁。

〔註11〕侯外廬主編，《中國哲學簡史》，北京，1959年版，第90～91頁。（高利克先生自己交代此書使用的是外文出版社英譯的侯外廬《中國哲學簡史》文本：Hou Wailu.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59 as Vol.5 of the series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entitled "Chinese Knowledge Series" intended mostly for the foreign readers. 177p. 該譯本所依中文版本沒有注明。此段為譯者參考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一書第四節《譚嗣同的〈仁學〉及其思想》（第267～277頁）相關內容所譯。譯者注。）

〔註12〕《我的小學時代》第5頁。

中選出的四個句子。後來他將背誦的句子數目增加到了十個。但要求得越多，茅盾能背誦的就越少，以致於到最後他一天幾乎記不住兩個句子。除此之外，他還命令茅盾學習《地理歌略》。後來他強迫茅盾研究數學，當他意識到自己的小兒子對這些東西相當木訥時非常地失望。〔註13〕

當然，他之所以對譚嗣同的思想如此感興趣還有其他的原因。

譚嗣同比康有為的其他追隨者更加激進。對他們來說，僅僅只完成一些改革，將中華帝國改變成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就足夠了。儘管譚嗣同沒有十分明確地表達這個意思，但他是反對滿清王朝，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民統）以代替君主專制政體（軍統）的〔註14〕。上個世紀末（應指十九世紀末，譯者注），在中國也有相似的要求。這個要求相當獨特，而且前所未聞。

通過對學習自然科學的強調，沈伯蕃表達出了他對那個年代學習經典所持的反傳統態度，也表明他深切相信譚嗣同成為他那個時代最不正統、最不傳統且帶偏見的中國思想家是可能的。也有可能他把譚嗣同看成是打破儒家倫理偶像的第一人。甚至在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陳獨秀（1879～1942）和魯迅（1881～1936）之前二十多年，譚嗣同就抗議所謂的「三綱」，即三種束縛的、兇殘的、破壞的和邪惡的毒害。「三綱」是漢武帝（公元前140～84）〔註15〕宮廷裏著名的哲學家董仲舒（約公元前179～104）提出來的。

「三綱」規定，君應該無條件從屬於其主，子應該無條件從屬於其父，妻應該無條件從屬於其夫。譚嗣同也反對一夫多妻制，反對中國婦女纏足。他談到兩性之間的平等權利，強調性教育作為解放運動不可避免的結果的重要性。〔註16〕

譚嗣同在很多方面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他的一個朋友，與康有為同為「百日維新」最著名的代表梁啟超（1873～1929）曾經說過，通過對這些革命成果進行護衛，譚嗣同比孫中山（1866～1925）的同盟會早了十年。Takashi Oka，

〔註13〕在上述引文中。也可參見《我的小傳》，載《名家傳記》第2版，上海，1938年版，第274頁。

〔註14〕Takashi Oka，《譚嗣同的哲學思想》（*The Philosophy of T'an Ssu-t'ung*），載《中國研究論文集》（*Papers on China*）第9卷，哈佛大學出版社，1955年，第2～3頁。（諮詢了兩位在日本研究譚嗣同的專家，均告知不知道有Takashi Oka這麼一個研究譚嗣同的日本學者，也不知道該怎樣將其日語名字譯成漢語。故保留不譯。譯者注。）

〔註15〕同上，第3頁和第12頁。

〔註16〕同上，第12～13頁。

一位研究譚嗣同作品的專家寫道：「其感情的強烈程度猶如雅各布賓派領袖馬拉（Marat-like）。」（註17）

由於其政治信仰、哲學信念和他對科學力量的信任，使得沈伯蕃站在他那個時代的頂峰。茅盾作為少數幾個先鋒派信奉者的兒子，至少部分地為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個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文化革命做了準備。

沈伯蕃死於1905年的夏天。那時茅盾年僅九歲。（註18）

沈伯蕃的妻子，茅盾的母親陳愛珠，接替去世的丈夫繼續指導茅盾的教育。茅盾對此充滿感激地記得。關於她的生活所知不多。知道的信息中大部分是茅盾妻子的弟弟孔另境（1904年生）寫的。他是一位中國戲劇家、散文家和舊體小說的創作者。（註19）

孔另境對她做了這樣的描寫：

沈老太太確是一位個性倔強的人物，而且彷彿還有點近乎冷酷，所以一般和她接觸的人，常會感覺得一種冷峻的壓抑，然而我們知道這一點正是她的不可及處。大致女性類多感情豐富，理智薄弱，加之中國的女性更受著數千年來傳統的禮教所壓制，故極難衝破環境，自作主張，其能拔萃於萬千儕輩，做出一點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來的，總非得先具備著一種極堅強的理智不可。沈老太太是具備這性格的，從她的毅然送伊二子赴遠地入學，可見其見地的卓越，及後對於兒輩的參加革命運動，目睹種種艱險的經歷，從未有半句勸阻或任何見於言詞的憂慮，實充分表現她堅強的認識。可惜她生得太早了點，不能充分接受許多新學識和新理論，否則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做出一點出人頭地的事業來。（註20）

沈夫人也是出生在一個小鎮上（註21）。作為一名中國女性，她的學問足夠多，而且非常喜歡閱讀。在她年輕時她非常喜歡讀中國舊體小說，後來她

〔註17〕 Takashi Oka,《譚嗣同的哲學思想》（*The Philosophy of T'an Ssu-t'ung*），載《中國研究論文集》（*Papers on China*）第9卷，哈佛大學出版社，1955年，第32頁。

〔註18〕 《我的小傳》第274頁和276頁；《我的小學時代》第4～9頁。

〔註19〕 孔另境，《一位作家的母親》，載《庸園集》第29～39頁。也可參見他的《懷茅盾》第65～66頁。在後一篇文章的第65頁，孔另境只提及茅盾母親的姓，她自己的名字是沈季豪告訴我的。

〔註20〕 《一位作家的母親》第33～34頁。

〔註21〕 《我怎樣寫〈春蠶〉》第13頁。